

身份之辩：大理“西镇”的祖先叙事

赵玉中

(昆明理工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 尽管在元明以来的官方史志中,大理“西镇”的“名家大姓”仍被视作一个不同于“汉人”的群体,但在民间同一时期的墓志铭与族谱等民间文献中,他们则大体上一直延续与不断地强调着他们所拥有的“汉人”祖先。“西镇”基于其祖先叙事之上的这一身份之辩,与大理洱海地区和国家之间历史关系的复杂性有关,亦与将“民族”想象为一个具有共同“血统”的历史实体的文化传统有关。在历史的进程中,处于华夏边缘的大理洱海地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曾经历几次重大的转变。每一次转变,均会重启这一地域社会空间的“结构化”过程,孕育或塑造其“地方文化的特色”。因此,对“民家人”到底是“汉”还是“白”的追问,本身就已简化或遮蔽了地方社会在历史时间中“结构化”过程的复杂性。

关键词: “西镇”; “名家大姓”; 祖先叙事; 身份之辩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7X(2014)01-0043-07

DOI:10.13727/j.cnki.53-1191/c.2014.01.008

“西镇”^①(West Town)因许烺光先生在1940年代出版的《祖荫之下》一书而被世界人类学界广泛知晓。不过,利奇(Edmund Leach)针对许先生“急于使民家人代表中国整体”的“缩影观”而提出的批评,以及1950年代“民家人”“白族”身份的制度性确立,却给一些学者带来了这样一种困惑,即“西镇”的“民家人”到底是“汉”还是“白”^②。直至最近仍有学者撰文为许先生“辩护”,声称他在1940年代用“西镇”代表整个中国其实并没有什么错,因为当时还没有“白族”^③,或称“西镇”的主要居民都是明朝以来来自内地的汉族移民,1950年代之后才逐渐变为了白族。^④

实际上,许先生的辩护者大多都误读了利奇对他的学术批评。利奇说,“因急于使民家人代表中国的整体,许(烺光)几乎不提地方文化的特色。这一明显的扭曲,使民家人的形象显得死气沉沉。他是在1941年7月到1942年9月间做的田野,但

他笔下的西镇却像是一个没有历史的文化,一个根本不受周围政治形势影响的文化。”^⑤显然,利奇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点。第一,“西镇”不能代表整个中国,即不能因强调中国文化的“整体性”而抹杀“地方文化的特色”。第二,许先生笔下的“西镇”是一个“没有历史”、“封闭自足”的社会。而在利奇看来,只有在研究中关注地方社会在内外、上下等各种力量的交互下“结构化”的动态过程,才能超越结构功能主义范式下“死气沉沉”的民家人形象。

在历史的进程中,处于华夏边缘的大理洱海地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曾经历几次重大的转变。每一次转变,均会重启这一地域社会空间的“结构化”过程,孕育或塑造其“地方文化的特色”。因此,对“民家人”到底是“汉”还是“白”的追问,本身就已简化或遮蔽了地方社会在历史时间中“结构化”过程的复杂性。本文拟结合对大理洱海地区社会历史过程的考察,通过对“西镇”人自

【作者简介】赵玉中,昆明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博士。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云南大理洱海地区民间文献的历史人类学研究”(项目编号:10BMZ037)、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大理洱海地区白族民间文献(墓志铭与族谱)的历史人类学研究”(项目编号:HZ201130)阶段成果。

- ① 为便于学术讨论,本文在正文中亦使用“西镇”一词来指代大理喜洲。但文中所引文献,有“喜洲”一词的,则予以保留,以保持引文的完整性。
- ② 梁永佳《地域的等级——一个大理村镇的仪式与文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34页。
- ③ 梁永佳《〈祖荫之下〉的“民族错失”与民国时期的大理社会》,“云南与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研讨会”会议论文,2008年3月。
- ④ 韩忠太《走出祖荫:六十年后的西镇人》,《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
- ⑤ Leach, Edmund. Social Anthropology. Glasgow: Fontana Press, 1982: 126~1.

元明以来身份之辩这一“结构化”过程的人类学分析,来审视与检讨“祖先”(血统)叙事与“民族”或“族群”身份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西镇”的“名家大姓”

在历史文献中,“西镇”曾被称为“史城”、“大厘(麓)”、“喜郡”、“喜睑”及“史睑”等,而在当地的白族语中,则被读作“很睑”。“西镇”历史悠久,地方学者认为,它就是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所置叶榆县的治所。^①确实,今天仍构成其人口主体的杨、李、赵、董等姓氏,汉晋时期便已见于中原文献的记载,被称为“部曲大姓”^②。直至初唐时期,“以杨、李、赵、董为名家”,“白云其先本汉人”,“皆云庄躄之余种”^③。此后,因南诏王权(738~902年)的建立,这些“名家大姓”才在中原文献的记载中被“贬称”为“蛮”。

据《蛮书》(863年)，“大厘谓之史睑。……太和城，大厘城，阳苴咩城，本皆河蛮所居之地也。开元二十五年(737年)蒙归义逐河蛮据太和城，后数月又袭破苴咩。盛罗皮取大厘城，仍筑龙口城为保障。阁罗凤多由太和、大厘、邓川来往。……大厘城南去阳苴咩城四十里，北去龙口城二十五里，邑居人户尤众。盛罗皮多在此城。”^④明万历《云南通志》亦载，“异牟寻以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嗣立，先居史城。……史城，今喜洲也。”^⑤又，唐文宗太和元年(827年)十一月，南诏王丰祐曾“建喜州土城，王宫迁都于此。”^⑥尽管上述几则文献的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共同点在于，它们都声称“西镇”曾为南诏王的重要居所之一。

连瑞枝认为,在大理洱海地区“西镇”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南诏、大理国杨、李、赵、董等僧侣贵族世家的重要聚居地。^⑦地方学者亦称,今天居住在“西镇”的白族大姓,绝大多数就是南诏“大厘城”河蛮大姓的后裔。^⑧

即便是在明朝征服大理之后,杨、李、赵、董等南诏、大理国以来的僧侣贵族世家在“西镇”的继承与延续,仍可从其墓志铭文中不难看出。如,据明成化七年(1471年)的《故宝瓶长老墓志铭》,世居“喜睑”的杨姓家族,从其始祖杨法律在唐贞观时(627~649年)被南诏摄授为吒力灌顶僧始,便以密教为其祖业。先祖大容曾被南诏王异牟寻尊为“灌顶国师,赐金襴法衣”。而其元代的曾祖、祖与考,“俱袭祖术”。及至明代的墓主“宝瓶长老”,还曾被明宣宗“召取赴北京”,“奉命启毘辣口密坛有感,赐袈裟法衣。”而后,其子仍“克绍父业”^⑨。自南诏、大理国直至明朝中前期,密教僧人在大理洱海地区一直都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也因此,在“西镇”地区的元明碑刻中,记述祖先为密教僧人的类似碑文,在其他诸如李、王、赵、董等姓氏中亦较为普遍。^⑩

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由于中央王朝文化政策的改变,大理洱海地区的密教传统开始遭到致命的打击,^⑪“西镇”杨、李、赵、董等僧侣贵族世家的社会地位也因此被严重削弱。不过,自明永乐间(1403~1424年)在云南开科取士以来,“西镇”越来越多的“名家大姓”便通过科举考试,转变其宗教身份,进入明朝的官僚系统,在地方社会中逐渐演变而为儒家的士绅阶层。至景泰间(1450~1456年),大理府“郡中之民,少工商而

① 张旭《南诏“河赋贾客”的衣胞之地——大理喜洲释名》,张旭主编《南诏·大理史论文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319~313页。

② 常璩《华阳国志校注》(卷4《南中志》),刘琳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第357页。

③ 梁建芳《西洱河风土记》,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2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18页。

④ 樊绰《蛮书》(卷五《六睑》),大理白族自治州文化局出版,1998年,第35页。

⑤ 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卷十六《羁縻志》),云南省图书馆藏传抄本。

⑥ 尤中《樊古通纪浅述校注》,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5页。

⑦ 连瑞枝《姓氏与祖先——云南洱海地区阶序社会的形成》,《历史人类学学刊》第4卷第2期(2006年10月)。

⑧ 张锡禄《南诏大厘城河蛮名家大姓世系考——大理喜洲白族十大姓研究》,张旭主编《南诏·大理史论文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年。

⑨ 云南省编辑组《白族社会历史调查》(四),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30页。

⑩ 石钟《大理喜洲访碑记》,赵寅松主编《白族文化研究2002》,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

⑪ 佚名《明实录云南事迹纂要·云南僧道》,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4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11页。

多士类，悦习经史，隆重师友，开科之年，举子恒胜他郡，其登黄甲跻华要者今相属焉。”^①明清两朝，仅在洱海地区的“西镇”一地，就出现了“二甲进士七八十，举人贡生数不清”的科举盛况。“名家大姓”由“崇佛”到“尊儒”的这种转变，亦可见于明清以来编纂的地方史志，以及明中期以后各“名家大姓”的族谱与碑铭。^②

时至今日，“西镇”的人口主体仍以杨、李、赵、董等汉晋以来文献记载中的姓氏为主，呈现出非常显著的延续性。尽管自元明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原移民涌入大理洱海地区，但据连瑞枝的研究，移民多以当地既定的“名家大姓”择姓的情形，是造成其他姓氏成为少数，甚至是消失的原因。^③另，据笔者的田野调查，在“西镇”，外姓移民相对较少，成为著姓的则更少，仅有严姓一族。^④倒是在云南的其他地州县市，诸如杨、李、赵、董等姓氏的族谱，却往往将其始祖溯至大理洱海地区，尤其是“西镇”^⑤。甚至远在湖南桑植县的“白族”，在其一年一度的祭祖仪式中，仍不忘念诵这样的《告祖词》：“萝卜有根果有蒂，莲蓬打从藕上生。家住云南喜州隘，苍山脚下有家园。”^⑥

二、元明以来“西镇”人的身份之辩

如前述，初唐以前中原文献记载中“自云其先本汉人”的杨、李、赵、董等“名家大姓”，在南诏王权建立之后，则被视为“河蛮大姓”。1253年蒙古人征服大理之后，大理洱海地区即被再次纳入中华帝国的文明体系。然而，在此后数百年的儒家文明进程中，这些在元人笔下“数百年之间五

姓守固”，“略本于汉”，“犹有故国之遗风”^⑦的“名家大姓”，却在此后直至民国年间的官方史志中，仍被视作一个有别于“汉人”的群体。

如，在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及稍后编纂的正德《云南志》中，元人李京笔下已由“僰人”转为“白人”^⑧的“名家大姓”，仍被标记为“僰人”。而在刘文征的天启《滇志》中，则又被记为“白人”：“白人，古白国之支流也。旧讹僰为‘白’，遂称其一类，实不相通。滇郡及迤西诸郡，强半有之。习俗与华人不甚远，上者能读书，其他力田务本，或服役公府，庶几一变至道者矣。”^⑨此后，清朝至民国的官方史志，大体沿袭了这一记述，均将这些“名家大姓”记为“白人”，并另称为“民家子”。如，《大理县志稿》称，“白民有阿白、白儿子、民家子等名。县中土籍亦多民家子。又白国之后，即滇中之土著。”^⑩

尽管如此，他们在此一时期对其祖先来源的“自述”（即“当地人的观点”），却与官方史志对他们族群身份的分类与描述有着极大的不同。

据出土于大理五华楼遗址，撰于元至正年间（1341~1370年）的《故理阳寨长官司案牒段璉墓铭并序》，“案牒姓段氏，讳璉，考其世系源流乃□（楚）庄躄之□□将官也。威王使躄伐滇，既克，会秦灭楚，躄遂留王滇池，以其众分为五将，而已总以统之，因成一□□□之属，段氏其一也。”^⑪此时的“名家大姓”再次经由“庄躄”这一中原文化符号“攀附”在“华夏”的祖先系谱之上。立于元至正九年（1349年）的《故父张照磨墓志》亦称，“张氏之祖名庆，乃清河之流派，

① 陈文《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9）《大理府》，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6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75~78页。

② 赵玉中《祖源记忆：社会情境与族群认同——〈大理喜洲翔龙村张氏族谱〉的个案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8期。

③ 连瑞枝《姓氏与祖先——云南洱海地区阶序社会的形成》，《历史人类学学刊》（第4卷第2期）（2006年10月）。

④ 笔者认为，韩忠太主要以西镇严姓的墓碑及族谱资料为例，来说明绝大多数的“西镇人”为明朝汉族移民的后裔，显然缺乏说服力。参见韩忠太《走出祖荫：六十年后的西镇人》，《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

⑤ 彭文位《〈尹忠墓志铭〉考释》，《保山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⑥ 刘晓艳《宗族文化中的历史记忆和族群认同——以桑植县白族为例》，《咸宁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⑦ 郭松年《大理行记》，郭松年，李京撰，王叔武校注《大理行记校注 云南志略辑校》，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6-26页。

⑧ 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郭松年，李京撰，王叔武校注《大理行记校注 云南志略辑校》，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86-89页。

⑨ 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7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8页。

⑩ 周宗麟等《民国大理县志稿》（卷3·33至35），1916年（1991年大理图书馆翻印本）。

⑪ 云南省编辑组《白族社会历史调查》（四），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7页。

蒙朝演习元□(佐)之后,□(掌)职监场。”^①至明初,这些“名家大姓”仍一如既往地籍其“姓氏”的地望(如“清河张”、“弘农杨”等)将其祖源联系到中原。如,据明宣德元年(1425年)的《故居士张公墓志铭》,“张之得姓,肇自清河,……其先自蒙以来,相与辅弼,克底于治,授文职,授武爵,枝分派别,莫可缕记。”^②

吊诡的是,约在1440年代至1500年间,“名家大姓”的祖源叙事却发生了极大的逆转。他们要么声称自己的祖先是来自西天竺的“婆罗门种族”,要么宣称是云南本地的土著——“九龙(隆)族之裔”^③。

明中期“大议礼”之后,嘉靖帝修改了明朝的礼制,诏令兴办社学,提倡乡约,改良社祭,在基层社会中大力推广儒家的正统礼仪。^④在践行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新王朝礼仪的过程中,“西镇”的“大姓”开始“有意”抹杀此前家族铭文中蒙、段时期的祖先记忆,仅将其始祖溯至元朝的“江南”移民。如,嘉靖丙戌进士(1526年)、大理人李元阳(1497~1580年)在其撰写的《给事中弘山杨士云墓表》中,就将正德丁丑(1517年)进士、“西镇”人杨士云(1477~1554年)的始祖溯至元时的“邓川州同知”^⑤。依此,蒙、段时期的家族历史在明中后期似一度成为了文化禁忌。

而在清至民国修纂的族谱中,“西镇”人又将“原隶江南籍”的“汉人”祖先记忆,与其家族祖先“唐初至滇,因仕蒙氏为相”等在蒙、段地方王权中建立的丰功伟绩巧妙地衔接了起来。如,董正官在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续修族谱时声称,“董氏世居云南大理府太和县之喜洲。……董氏之先讳成者,江南金陵县五里桥人。唐时入滇。为南诏清平官。”^⑥对于这种祖先叙事,总纂道光《云南通志》的大理洱源人王崧(1752~1837年)在其为董氏族谱所作的序中就提出了质疑,“云南在

汉隶牂牁郡,而有大姓董氏见于《华阳国志》,则南诏之为清平官者或即其裔乎。”^⑦显然,在王崧看来,董氏其实早在汉代即已居住在云南。

三、现代国族及民族建构中的“西镇”人

中华民国建立之初,中国的各界知识精英即展开了中国国族的学术建构工作。如,民国五年的《大理县志稿》,虽仍将“近今亦寥若晨星”的“我邑土著”——“民家子”记述为“白国之后,即滇中之土著”,但纂修者们亦同时大声疾呼,黄帝的子孙不该再有“种族思想”,因为此时“美雨欧风东来,大陆斯拉盎格窥伺中原”^⑧。

民国初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的“西镇”人杨炳东,在“旧谱以兵燹而遗失”的情况下,仍不惜“竭力叠往祖莹觅碣寻碑”,并参照族人所收之神主牌,执意重纂杨氏族谱,声称“吾杨氏原籍江南应天府上元县柳树湾。明初从沐公征云南。以功授千户。遂家于大理太和。”1931年族谱修成之时,他在自己撰写的族谱“序言”中,还大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国族主义,并极力说明编撰家谱对于整合国族的重要意义。^⑨

在此一为实现国族整合的历史潮流中,我国的各界学人多将大理洱海地区的“民家人”视为中原汉人移民的后裔,^⑩强调“民家人”与“汉人”在人种(血缘)、语言与文化上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并以此来回应与批判清末以来西方殖民主义势力所建构的“南诏为泰族建立”这一错误理论。^⑪

早在1936年,马长寿就指出,“现代之民家已非纯种。该族自称其族迁自南京,该亦有故。我国明初调江南兵士征滇者甚多。滇平,咸以道路遥远,遂皆在滇落户。其与白女婚媾所生之子女,白人称之为‘白儿子’,汉人称之为‘民家’。民家一作‘明家’。民与明同音,盖即明朝百姓,或明

① 云南省编辑组《白族社会历史调查》(四),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6页。

② 大理市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编《大理古碑存文录》,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年,第97~99页。

③ 石钟《大理喜洲访碑记》,赵寅松主编《白族文化研究2002》,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54~86页。

④ 科大卫《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卜永坚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9页。

⑤ 黄元治《康熙大理府志》(卷29《艺文》)。

⑥ 董沛川,董万川《大理史城董氏族谱》(内部资料)(卷十二《题名录》),1922年。

⑦ 周宗麟等《民国大理县志稿》(卷3·33至35),1916年(1991年大理图书馆翻印本)。

⑧ 杨炳东,杨杰《云南大理县喜洲中和邑杨氏族谱》(内部资料),1931年。

⑨ 石钟《大理喜洲访碑记》,赵寅松主编《白族文化研究2002》,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54~86页。

⑩ 参见林超民《译者序》,〔美〕查尔斯·巴克斯《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林超民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人后裔之义。该族语言中，汉语字源最多，即职斯之故。”^① 范义田认为，“明家”与“民家”同音异写，“明家人”实为汉族构成之汉氏混种。^② 在细致梳理此前学界有关民家之名、民家族源以及民家语言系属划分的不同观点之后，徐嘉瑞提出，“民家”应称“名家”，来自中土，为中原大姓。民家人为汉人和白蛮混合的种族。^③

任教于华中大学^④的包鹭宾亦认为，“白蛮之族，以余所见，其先原本汉人，徒以久居蛮地，渐与之化，又与蛮中齐民，相为婚媾，其后子姓蕃衍，自成一族。汉人不察，遂亦以蛮视之，而不知其姓氏风俗以至语言，固尚多保存汉人之旧也。”^⑤ 同在华中大学任教的许烺光，虽然承认“当地人的种族起源仍是一个争论未决的问题”，但却同时指出，“所有的西镇居民和附近九村中八个村子的居民都坚持说他们本是汉族血统。他们中间流传着许多有关他们的祖先从中国内地省份迁徙至云南的故事。他们最常提及的祖籍地是‘南京’。”^⑥

杨庆堃 (Martin M. C. Yang) 先生对民家人的族群身份亦曾做过这样的讨论，“《云南概览》上没有将民家作为土著民族列出，可能是因为他们已经吸收了足够的汉（文化）而被认为是汉人了。”^⑦ 实际上，即使是将“民家人”看成是“泰种人”的费子智 (Charles P. FitzGerald) 也认为，“民家人中缺乏强烈的民族情感使得许多旅游者将他们看作是被同化的人。”^⑧

不过，1950年代初期“民家人”被正式确立为“白族”之后，“白族”的起源与形成问题随即在学界引发了广泛而激烈的争论，认为关于白族的起源，历史上曾流行过四种说法，即“傣族说”、“印度阿育王之后说”、“羌族说”和“汉族说”。

不过，在争论中，前二说先后被否定。尽管方国瑜坚持认为，白族乃以汉人为主的多种种族的融合，但马曜等白族学者则单方面地强调白族的“本土”起源，提出“土著说”^⑨。

显然，新中国建立后，“白族”知识精英即顺应新的历史潮流，在新的政治框架中开始以“民族”这一概念范畴来重新诠释“民家人”的历史来源。不过，“西镇”的“民家人”对“民族”与“血缘”之间关系的理解，却没有来得那么及时与到位。如，据朱家桢等人1950年代末的调查报告，“喜洲白族人，能够准确无误地追溯出其远祖来历者很少，询问起来，大都说是‘从南京应天府来’；或者说是‘从江南来。’……其实，在大理喜洲一带的白族中，确有一部分明代甚至唐代天宝战争中落籍的汉族，但以后都被融合而成白族。但今日之主体白族却都是西洱河蛮大姓的后裔。”^⑩ 显然，这段文字记载的“西镇”人的祖先叙事，与前引许烺光的调查材料之间具有极大的继承性。而在许先生看来仍“争论未决”的种族起源问题，在朱家桢等人的报告中得以顺利解决，即“今日之主体白族却都是西洱河蛮大姓的后裔”。

四、“白族”身份与“汉人”祖源

199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政治环境的日益宽松与居民生活条件的逐渐改善，一些“西镇”的家族决定续修族谱。不过，在着手续修族谱的过程中，一些人开始意识到，旧谱记载中的“汉人”祖源与其现实的“白族”身份之间似有着不可化约的“矛盾”。于是，个别姓氏在其家族知识精英的积极主导下，更改了其旧谱中的祖先叙事。

① 马长寿 《中国西南民族分类》，《民族学研究集刊》第1期，1936年5月。

② 范义田 《滇西明家人史略——“明家人为汉族构成之汉氏混种”之考证》，《东方杂志》（第39卷），1943年。

③ 徐嘉瑞 《民家新诂》，《东方杂志》（第42卷），1946年。

④ 华中大学为今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之一。1939年至1946年间，为避战乱而迁至大理喜洲办学。

⑤ 包鹭宾 《包鹭宾学术论著选》，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40页。

⑥ Hsu, Francis L. K. Under the Ancestors' Shadow: Kinship, Personality, and Social Mobility i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1948; 1967]: 16.

⑦ Yang, Martin M. C. "Peoples and Societies in Yunnan (Part I)." In Journa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Taipei) 16, 1978: 21.

⑧ FitzGerald, Charles Patrick: The Tower of Five Glories: a Study of the Min Chia of Ta Li, Yunnan. London: The Cresset Press, 1941: 14.

⑨ 任方 《关于白族起源的争论》，杨堃，等编 《云南白族的起源和形成论文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81页。

⑩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编 《白族社会历史调查》，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78页。

如,张锡禄就对张氏为何要更改其“汉人”祖先的叙事作了如下的论证“读我喜洲翔龙村(清)光绪丙申(1896年)《重修张氏族谱》云:‘始祖张公讳建成原籍江南凤阳府人,元时官滇之通海路桥州知州,负奇好义,仗义倜傥,榆段高其名迎至礼遇,遂卜居太和之喜脸,载郡志’。为此,我翔龙村张氏皆云:我自江南来。是安徽凤阳府人,云云。真是这样的吗?经过我们认真研究,这不符合历史事实,是虚拟的、错误的。首先我查了元代有关的史书,元时滇省根本没有‘通海路桥州知州’的设置。……而各种史志所载张建成成为唐代南诏时喜洲人。而不是元代江南凤阳人。据喜洲弘圭山我翔龙村祖莹明代墓铭所载,我张氏为南诏、大理国之巨族,是九隆族之裔。”^①

类似地,高氏亦声称,“高姓乃土著白族之裔,并非外来之移民,”并将其始祖溯至曾夺取段氏的王权,并建立“大中国”的大理国鄯阐侯高升泰。”^②为了论证现有“白族”身份的合理性,主持族谱续修的族人往往将旧谱中“庄躄”、“诸葛武侯”、“清河张氏”或“唐时或明初入滇落籍”等这些“汉人”祖先的象征符号全部“结构性地失忆”(structural amnesia)^③,进而选择汉文献记载中的“九(龙)隆族”或“西洱河蛮”等这样的土著文化符号,来凸显其家族先祖在南诏、大理国等地方王权中所建立的卓越功勋。

不过,因对家族祖来源的意见并不一致,更改祖先叙事的动议在族人之间曾引发了很多矛盾与冲突。有人甚至因为反对更改祖先叙事而退出了族谱续修小组。^④比如,“西镇”的杨姓在续编族谱时,有关宗族的“族源”和“族属”问题,续谱小组中就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旧谱中称杨氏宗族来自甘肃“陇西”的说法无可质疑;而另一种意见却认为,杨氏宗族是土生土长的“白族后裔”,是大理洱海地区历史上的望

族,并非来自“陇西”。因族人杨遵道民国年间即毕业于金陵大学历史系,解放后又曾先后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历史系,族谱续编小组就此写信征求他的意见。

为此,杨遵道专门写了一篇五千余字、题为《关于喜洲杨氏宗族族源和族属的管见》的文章,提出了以下几点意见:第一,今天居住在喜洲的诸大姓,是千百年来生于斯长于斯的土著民族,历唐、宋、元、明、清一脉相承。只是在明初高压政策下,当地土著不敢称自己是土著,从而假托来自陇西。第二,喜洲各大姓中,只有严家是沐英的军官留在喜洲定居的后代,其他杨、赵等大姓则为土著。第三,旧谱中关于“族源”和“族属”问题的说法与历史多有矛盾。世居大理喜洲的杨姓没有从外籍杨姓迁徙来的。然而,杨氏宗族续谱小组最终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而是依然延续了1949年杨氏宗族编印的《大理喜洲杨氏宗族概况》一书观点,即认为杨氏宗族来自“陇西”^⑤。

2008年农历七月,“西镇”的尹氏族人在其修葺一新的宗族祠堂中张贴的世系图上,依然宣称“始祖系南京天水郡应天府原籍,从汉相诸葛至滇”。这一说法源自其旧谱中的“序”^⑥。类似地,在1986年重修的族谱中,赵氏族人仍称,“我赵氏族源发于天水,故我赵氏宗祠名为天水宗祠。百家姓草本注脚亦称我赵姓为天水,因此天水为我族发源地有其依据(即今甘肃省天水市)。我族始祖唐蒙氏大将军赵夺帅,唐朝时由金陵入滇之传与我族发源于天水之事互不排斥。”^⑦

五、分析与讨论

初唐以前文献记载中的杨、李、赵、董等大理洱海地区的“名家大姓”,在南诏王权建立之后,曾被一度贬称为“蛮”。尽管在元明以来的官方史志中,“西镇”的这些“河蛮大姓”,即南诏、大

① 张锡禄《喜洲翔龙村张氏始祖考》,张锡禄,张天伦,张锡恩等《大理喜洲翔龙村张氏族谱》(内部资料),2002年,第200页。

② 高鹤品,高鹤池合编《大理喜洲高氏族谱》(内部资料),1996年。

③ Gulliver, P. H. The Family Herds: A Study of Two Pastoral Tribes in East Africa, the Jie and Turkana [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55: 108.

④ 段伟菊《祖荫下的西镇人》,庄孔韶等《时空穿行——中国乡村人类学世纪回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99页。

⑤ 杨遵道《仁宇八句自述》,北京:华龄出版社,2008年,第9~17页。

⑥ 佚名《尹氏族谱》(内部资料),1849年。

⑦ 董承汉《大理史城赵氏族谱世系全卷序》,《大理史城赵氏族谱(坡头村)》(内部资料),1986年。

理国的僧侣贵族世家,仍被视作一个不同于“汉人”的群体,但在同一时期的墓志铭与族谱等民间文献中,他们大体上一直通过“汉人”的祖先叙事来辩称其与“华夏”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直至1940年代,即便对许烺光而言“无论西镇人是否是汉人移民和当地土著混合后的后裔,还是一支汉化较为彻底的土著后裔,这些都不十分重要,”但“西镇人坚持他们是汉族的后裔。如果有人对此稍有怀疑,他们便很不高兴。……西镇人不仅具有汉人的文化习俗,而且还试图表明,他们在某些方面比中国其他地区的汉人更像汉人。”^①

在1950年代的“民族”识别,及此后“民族”历史文化书写中,“民族”在中国学界常被表述、想象或建构而为一个具有共同生物性血缘关系的群体。以厘清血缘关系为主要目标的“民族”起源研究,也因此成为我国学界论证某一人群“民族”身份合法性的前提。“民族”群体的祖先叙事,不仅被等同于“民族”对其自身“血统”的说明,同时也被认为是“民族”表达其民族身份认同的主要手段。然而,在此一过程中,历史上不利于说明其少数民族“血统”的各类“歧义”的祖先叙事,则往往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或遮蔽了。

1950年代“民家人”“白族”身份的制度性确立,亦使一些“白族”知识精英感觉到其现实

的“白族”身份,与其自元明以来对“汉人”祖先的强调之间,有着不可化约的“矛盾”。在“白族”起源与形成问题的大争论中,他们往往单方面地强调“白族”的土著起源,宣称“今日之主体白族却都是西洱河蛮大姓的后裔”。显然,“西洱河蛮大姓”与初唐以前中原文献记载中的“名家大姓”之间的继承性被有意地切割了。类似地,自1990年代以来,“西镇”的个别姓氏,在其家族知识精英的主导下,着手更改其自元明以来在墓志铭与族谱中所确定的“汉人”祖先叙事。于是,“西镇”人自元明以来在中国儒家化“文明”进程中的族群认同变迁,亦被有意地遮蔽了。

毋庸讳言,基于祖先叙事所建构的家族世系,并非是一个生物传承意义上的世系,而仅仅是一个“文化解释的世系”(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descent)^②而已。因此,本文的讨论意在指出,“民族”其实并不一定是一个具有共同“血统”的历史实体。“西镇”基于其祖先叙事之上的这一身份之辩,与大理洱海地区和国家之间关系的历史复杂性有关,亦与将“民族”想象为一个具有共同“血统”的历史实体的文化传统有关。然而,在我国民族历史研究中,要彻底地走出民族“历史实体论”的影响,而将“民族”视为一个“因时因地而变化”的过程^③,则尚待时日。

Identity Debate: Ancestry Narratives of the “West – Towners” in Dali

ZHAO Yu – zhong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Kunming University of Social Sciences, Kunming 650500, China)

Abstract: While regarded as an ethnic group different from the “Han Chinese” in the official historical documents since the Yuan dynasty, “the Great Clans with Chinese Surnames” of the “West Town” continually claimed or stressed their “Han Chinese” ancestry. This debate on the ethnic identity is related not only to the historical complexit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li in the Erhai Lake area and the Imperial Court, but also to the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which invariably imagines a “nationality” as a historical entity with a common “blood”.

Key words “West Town”, “Great Clans with Chinese Surnames”, ancestry narratives, identity debate

(责任编辑 伍琼华)

① Hsu, Francis L. K. *Under the Ancestors' Shadow: Kinship, Personality, and Social Mobility i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1948; 1967]: 18.

② Keyes, Charles F. *The Dialectics of Ethnic Change*. *Ethnic Change*, ed. by Charles F. Keye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1: 5.

③ 费孝通 《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费孝通文集》(第14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88页。